



重要言论

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党中央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动员全党全国满怀信心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作出的重大决策。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大有考论

人民就是江山

□ 张太原

习近平总书记在2月20日召开的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由几十个人的小党发展为今天拥有九千多万党员的大党，之所以一路走来创造了世所罕见的奇迹，之所以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定力与活力，就在于坚持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一）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列宁强调，布尔什维克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要“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代表他们的利益。这里的“绝大多数人”就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即是那个时代的最广大人民，无产阶级立场就是人民的立场，无产阶级的利益就是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早在民族抗战初期，毛泽东就声明：“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1939年2月，在致张闻天的信中，毛泽东最早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概念。1944年，他在张思德追悼会上的讲话，以《为人民服务》为题发表在《解放日报》上，成为后来著名的“老三篇”之一。因一个具体人物而提出一个明确的思想，其本身就带有一种人民性。当时，毛泽东是很自然地讲出来的，甚至预先连草稿都没有。他说：“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他再一次强调，中国共产党要“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在党的七大上，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写进了党章，定为党的宗旨。

任何一个政党都要面对与处理同人民的关系。提出“为人民服务”的要求并不难，难的是真正做到这一点，难的是坚持做到这一点。然而，这样一种政

治理念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头脑中历久弥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毛泽东同志关于共产党人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思想，到邓小平同志关于必须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改革和一切事业根本标准的重要思想，到江泽民同志关于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思想，到胡锦涛同志关于必须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的重要思想，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思想主线，这就是：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上，一切为了人民、一切相信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共产党人的本”。因而，党不能有自已的私利，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任何时候都必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利益和核心价值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决不可为个人或少数人谋私利”；“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可以说，这充分体现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讲到：“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

这一重要理念贯穿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全部实践之中，并最终升华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二）

“人民就是江山”是对党自身历史经验的总结。毛泽东说过：“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正因为同人民结合起来，才“生根、开花”。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根植人民”。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我们党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都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百年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事业的成功，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所以能够日臻强盛，“靠的是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依靠人民取得了“江山”，而守护“江山”，使“江山不易”，同样要紧紧依靠人民。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指出：“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他还指出：“我们跟蒋介石和日本一共打了二十二年，主要一条经验是，要同群众结合起来。什么时候跟群众合作得好，我们就得到发展；什么时候脱离群众，我们就犯错误，就失败。”毛泽东之所以多次这样讲，是因为在处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上，党是有过深刻教训的。比如，在江西时期，“左”倾错误不懂得广泛地争取群众，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土地政策，不顾实际条件，号召群众进行城市暴动。

面对党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是在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中成长、发展、壮大起来的。人民是党的力量之源和胜利之本。没有人民的支持，党就不可能生存和发展，就一事无

成。因此，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优势。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削弱和丢掉这个优势，否则党的一切工作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招致挫折和失败。”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取得的一切胜利和成就，都是“密切联系群众”的结果。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党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能否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决定着党的事业的成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更加多样，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更加广泛，人民的视野更加开阔，人民的眼光更加明亮。党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才能察民情，解民忧，惠民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如果我们脱离群众、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最终也会走向失败”。人民群众始终是党的坚实执政基础。只要永不脱离群众，党就能无往而不胜。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才能做到坚如磐石。俗话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只有具有广泛、深厚、可靠的群众基础，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才能使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从世界范围来看，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正确处理与人民的关系。一个心中没有人民的党，不代表人民利益的党，人民又怎么会支持它呢？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度过风波和海浪，使科学社会主义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根本原因就在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就能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秘诀，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时刻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明白人民真正的需求是什么。因此，“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可谓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中国要在世界上展现中国智慧，提供实现现代化的新样本，就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扬中国式的民主；就必须用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中国道路是更符合人类全面发展需要的。可以说，“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历史经验，也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共产党继续前行的力量源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是崇尚行动的。实践高于认识的地方正在于它是行动”。“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不是空话，而是持续地实践和行动。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政治理念与社会实践密不可分，说到做到。毛泽东强调，“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

如果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和中国共产党人的自身发展历程，放到中外政权兴替的大历史视野中去审视，就会发现“人民就是江山”确实是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一种政治理念，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情感符号。这样一种政治理念和情感符号最大的特别之处，就在于能够最终体现在人民的实际生活之中，解决人民的实际问题，为人民谋幸福，接受人民的检验，让人民自己去评判，照此做下去，不但可以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使“风景这边独好”，而且可以使江山永固，长治久安。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陈云谈学习党史

□ 徐建平

陈云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开创者奠基人，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第二任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经历了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参与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和实施，与党和国家的历史密切相关。陈云极为重视对党的历史的学习和研究。

洞房给新婚妻子讲党史

延安时期，“陈云在洞房给新婚妻子于若木讲党史”曾经被延安的党员干部传为佳话。陈云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由于疲劳过度，导致流鼻血的旧病复发，一时非常严重。组织上为了照顾他的身体，从陕北公学选调学生党员于若木来护理他。

到陈云身边工作，于若木后来回忆道：我去后，只是给他按时往鼻子里滴滴药水，并没有更多的事可做。因为医生要求静养，他不能做很多工作，所以便经常和我聊聊天，有时还让我唱革命歌曲，我唱了苏联的《祖国进行曲》给他听。相处久了，彼此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感情，关系逐渐密切起来。有一天，他对我说：“我是个老实人，做事情从来老老实实在。你也是一个老实人。老实人跟老实人在一起，能够合得来。”不久，我二哥于道源来到延安，陈云同志把他作为我家的代表，郑重其事地把他请来，向他说明了我们要打算结婚的想法，征求他的意见。我二哥对陈云同志的印象甚好，欣然同意。于是，我们在1938年3月结了婚。我们的婚礼十分简朴。结婚那天晚上，陈云只花了一元钱，买了些糖果、花生，请中央组织部的同志来热闹了一下，就算是婚礼了。婚后不久，陈云曾用3个晚上给我讲党史。讲到大革命失败后，盲动主义给党造成的损失，讲到顾顺章、向忠发叛变对党中央造成的威胁，讲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毛主席对党 and 红军的挽救等等。以后，陈云又让我到中央党校学习了五个月，结业后，我又进了马列学院学习。到那里讲课的，大多是中央领导同志和在延安的大学者。陈云也去讲过党的建设。这门课的内容十分严肃，他讲了一个党员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就是要奋斗到死，用上海话说，就是要干到“翘辫子”，给学员留下深刻的印象，坚定了大家革命的信念。由此可见，陈云十分重视党史的学习。陈云比于若木大14岁，此时陈云已经是个经过生死考验的成熟革命者，而19岁的于若木只是个学生党员。用于若木的话来说，“两人能力地位相差太远，在他面前越显得自己幼稚无能。”对党员的教育，对自己亲人的教育，陈云同样严肃认真。

对党史问题要实事求是

陈云对党史中重要问题的研

究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一贯坚持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曾经担任陈云秘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朱佳木回忆在陈云身边工作时，听到他对党史中的重大问题发表了大量论述。比如，关于所谓“伍豪启事”问题、关于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问题等。

1932年2月，上海的国民党特务机关从叛徒口中得知“伍豪”是周恩来在天津创办觉悟社用的别名，便想出在报上刊登“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假消息的毒计，企图瓦解共产党的人心。在“文化大革命”中，此事被“四人帮”用来攻击周恩来。周恩来当即驳斥，指出这是敌人的造谣。但因为当时周恩来已经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对敌人的阴谋并不知情，对当年地下党辟谣的情况也说不清楚，便打电话问陈云。陈云虽然在当时的临时中央，但已经离开特科，到全国总工会工作，只知道是敌人造谣，并不知道辟谣的具体经过。为防止他们再拿这件事做文章，1972年5月，在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陈云在小组会上发言称自己知道这件事，并指出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共产党人要负责任，需要向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是国民党的阴谋。同时，他又写了书面发言指出“我现再书面说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许多原中央特科工作者得到平反，有关部门召集这些同志开座谈会，请大家回忆地下工作的历史。陈云作为原中央特科的领导人，接见了这些曾在隐蔽战线为党作出特殊贡献的老同志。陈云在讲话中就提到要把“伍豪启事”的前前后后搞清楚。后来，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根据陈云的意见，联合撰写了《伍豪启事的前前后后》，用确凿的事实说明，“伍豪启事”完全出自敌人之手，我党地下组织在其刊报后，采取了巧妙的办法给予揭露。

对党史中的重大问题，陈云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把历史问题放到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1983年7月，辽沈战役纪念馆请陈云为他们编辑的《辽沈决战》一书题写书名。陈云把书稿要来看后，让秘书整理了《对编写〈辽沈战役〉一书的意见》。对东北解放战争中的一些敏感的历史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陈云实事求是的分析令人信服，为正确评价东北解放战争历史提供了科学依据。

推动解决党内重大历史是非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陈云强调要恢复和坚持党的实事

求是的思想路线，带头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积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推动邓小平复出、平反冤假错案、科学评价毛泽东等党内重大历史是非问题的解决，起到重要的作用。

1977年3月10日，陈云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前，与胡乔木商量，又征求耿飏、王震等老同志的意见，非常郑重地写了200余字的书面发言稿。3月13日，陈云在西南组作书面发言，明确提出“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陈云的意见得到与会大多数同志的赞同。陈云的发言不同于“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会议工作人员要求陈云修改这篇书面发言，在会议简报上刊登，被他拒绝。3月17日，陈云在小组会上发言说：“时机成熟的时候，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很赞成。”这实际上是对邓小平复出的又一次呼吁。4个月，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复出，顺应了历史的要求，符合全党全国人民的愿望，为顺利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1978年11月12日和12月10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两次发言，先后提出要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既积极又稳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全力支持有错必纠，积极推动平反冤假错案。他领导中央纪工委直接负责复查刘少奇、瞿秋白等在全党全国有重大影响案件的平反工作，推动了拨乱反正的进程。

随着拨乱反正的全面开展，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就成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对此，陈云反复强调，“需要写上党成立以来六十年中间毛泽东同志的贡献，毛泽东思想的贡献。因此，建议增加回顾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段落。有了党的整个历史，解放前解放后的历史，把毛泽东同志在六十年中间重要关头的的作用写清楚，那末，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陈云的意见为统一全党的思想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陈云有关学习和研究党史问题的论述，是他学习哲学和一生遵循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一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方法的具体运用，对我们当前学习“四史”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作者系陈云思想生平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唯实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

